

新中国 扫盲教育史纲

XINZHONGGUO

SAOMANG

JIAOYU

SHIGANG

主 编 刘立德 谢春风

副主编 杨中华 张竺鹏



安徽教育出版社

新中国扣教育史纲

XINZHONGGUO SAOMANG JIAOYU SHIGANG

主 编

刘立德 谢春风

副主编

杨中华 张竺鹏

编 委 (以汉语拼音为序)

郝淑仪 刘立德 潘上行

王晓平 谢春风 杨 林

杨雪梅 杨中华 叶奕民

张竺鹏 周春红

主 审

宋恩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 / 刘立德等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36-3260-5

I. 新... II. 刘... III. 扫盲—教育史—中国—1949~ IV. G72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7223 号

选题策划: 吴寿兵

责任编辑: 殷振群

装帧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2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822632

邮 编: 230063

序

宋恩荣

2001年元旦,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已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中国兑现了1987年11月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00年以前基本扫除文盲的行动计划。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比率已由15.88%下降为6.72%。其中青壮年文盲的比率已下降到了5%以下。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就。

扫盲教育的意义,首先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规定: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强烈谴责教育的不平等,认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等之甚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早年在论及青年目标问题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目不识丁,无知无识,怎么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保障自己的“生存、温饱与发展”呢?

晚清时期的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代表作《新民说》中首倡民族启蒙学说,指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他大声疾呼: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主张“维新吾民”要在“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等方面着力,并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对当时乃至其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晏阳初的“新民思想”就是梁启超“新民说”直接影响的结果。

作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改革探索者,晏阳初在法国的华工营中发现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脑矿”。他认为,劳苦大众身上有无限的“伟力”,他们需要人格的平等,需要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出现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以“开启民智”、重塑国民、改造民族为职志的。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们认为,在文盲充斥的国度,“共和国”的“国民”,只能是“顺帝之则”的“老愚民”。帮助民众摆脱蒙昧,唤醒自主意识,成为那个时代许多教育家的强烈愿望。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等创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先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这揭示了扫盲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启蒙性价值。1943年,晏阳初在美国针对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提出了第五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实现这一自由的最基础工作就是平民教育,而平民教育最现实、最急迫的任务首先是识字教育。晏阳初的论断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起,晏阳初和同时代的其他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傅葆琛等不约而同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识字运动。起于民间的识字运动,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号召,着眼点在于提升民众的素质,造就合格的国民,以适应人民当家做主的需要。

民国时期,民间的识字运动推动了官方的民众教育。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曾经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推行义务教育、成人识字教育以及扫除文盲的法令、法规。在不少地区,识字运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文盲人数相应减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对军民的识字教育十分重视:在中央苏区,大力开展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识字运动,设立消灭文盲协会,创立了夜校、半日校、业余补习学校、冬学、识字班、问字所、识字牌、识字岗等多种扫盲教育形式;在陕甘宁以及华北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都有创造性的发展,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行。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战争的影响,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仍有 3.2 亿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达 80%。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在旧中国留下的极为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经过 5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发展为一个规模宏大、门类齐全完整体系,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教育水平还不高,无论从数量和质量看,与国家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在 2000 年已经“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但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方面仍然面临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 15 岁以上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仍有 8 507 万人,其中 2 000 万是不能读书看报与现代文明隔绝的青壮年文盲。这些文盲大都生活在经济、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经费短缺、教育基础较差、文化生活匮乏、信息闭塞和意识落后导致扫盲的组织和

动员困难较大。从扫盲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扫盲教育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个别地方的扫盲教育有时还带有运动性和突击性色彩,为制造轰动效应而片面追求入学率、脱盲率,片面地强调速成而忽视扫盲教育的质量;个别地方搞“政绩工程”,不惜弄虚作假,编造统计数字。另外,脱盲的水平偏低,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及统计指标尚有一定差距。我国的成人识字率在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和排序中仍居于中等偏下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扫盲教育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

把中国的扫盲教育史作为一项专题来进行系统的研究,除(日)大原信一著《中国的识字运动》(日本东方书店,1997年)、余博等主编的《中国的扫盲教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8)和廖其发主编的《当代中国扫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回眸与前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外,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见。《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的编写出版弥补了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首先追溯了近代以来识字教育的缘起,回顾了清末识字学塾计划、章程等有关条例的制定,具体概述了民国时期官方关于识字教育的机制与民间识字教育、扫盲运动的流派、实验及成就,藉以说明新中国扫盲教育的基础与起点。然后依次介绍了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扫盲教育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及实施情况、成绩和问题。通过编写者对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的系统梳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人民受教育权”方面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还可以看到,教育的发展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的制约。当国家的经济发

展与政治建设在一个健康、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教育就能顺利发展,人们的受教育权就能得到保障;当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偏离正常轨道时,教育往往被裹挟跟进政治浪潮,过度地强调政治性的功利功能,结果使教育一度沦为政治的工具与附庸,而扼杀了教育的本来价值。扫盲教育也不例外。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近30年的扫盲教育,是当代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在如实介绍并充分肯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扫盲教育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跃进”中不顾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与教育的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指标,出现瞎指挥、浮夸风给扫盲教育带来的许多不良影响。

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在谈到史料问题时曾说:“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实事为重也。至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是一部以史料见长的著作,这样的定位并不是贬低它的学术意义,相反恰恰显现出该书独特的价值。在当前学风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史料工作的情势下,不急于“长篇巨制”,不急于“振聋发聩”,能沉下心来认真地从史料的积累进步进行研究是值得鼓励的。因此,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可贵。研究当代教育史,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主要的着力点还应在于史料的积累。那种撇开史料,动辄企图以固定的思维范式框限半个多世纪以来既丰富多彩、成就辉煌而

又步履艰难、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不是一种学术性的路数。

总之,本书的贡献主要在于存史。存史,不只是机械地照录史料文献,也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过程,而是要对搜集到的资料加以科学的处理(包括史料的鉴别、史事的考校、文句的比勘)和组织;记述史实和梳理历史脉络应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力求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合乎规律地表现事物的发展进程。“求实存真”是史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是应该给与肯定的。相信在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新、更多的成果。

2006年6月12日于北京

(本序作者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理事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教育史研究室主任)

目 录

序	宋恩荣 (1)
---------	---------

第一章 新中国扫盲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

一、清末、民国时期扫盲教育概况	(2)
二、民国时期扫盲教育主要流派(上)	(7)
三、民国时期扫盲教育主要流派(下)	(14)

第二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扫盲教育

一、本期扫盲教育概况	(22)
二、扫盲教育管理体制	(30)
三、扫盲教育法规建设	(32)
四、扫除文盲的标准	(33)
五、扫盲教育的目标	(34)

第三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扫盲教育

一、本期扫盲教育概况	(37)
二、扫除文盲的对象及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	(71)
三、扫盲管理机构、教育机构及组织形式	(72)

第四章 扫盲教育的停滞、恢复和发展

一、本期扫盲教育概况	(75)
二、扫盲教育的目标、方式与方法	(82)
三、扫盲教育的教材	(85)
四、扫盲教育的管理机构	(86)
五、扫盲教育要求的变化	(87)

六、职工扫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89)
----------------------	--------

七、农民扫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92)
----------------------	--------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扫盲教育(上)

一、“国际扫盲年”活动的开展	(100)
----------------------	---------

二、扫盲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123)
-----------------------------	---------

三、新《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的颁布和扫盲教育的深入开展	(149)
-------------------------------------	---------

第六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扫盲教育(下)

一、“九五”计划的制定和全国扫盲工作会议的召开	(174)
----------------------------------	---------

二、20 世纪末扫盲教育攻坚战	(197)
-----------------------	---------

三、本期扫盲教育的目标、考核和验收	(225)
-------------------------	---------

四、本期扫盲教育的基本特点	(233)
---------------------	---------

第七章 新中国扫盲教育的成就及展望

一、新中国扫盲教育的主要成就	(242)
----------------------	---------

二、当代中国扫盲教育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246)
--------------------------	---------

三、今后我国扫盲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252)
-------------------------	---------

附录

新中国扫盲教育大事记	(257)
------------------	---------

新中国扫盲教育法规、文件选编	(288)
----------------------	---------

国外扫盲教育概况	(371)
----------------	---------

主要参考文献	(396)
--------------	---------



第

章

新中国扫盲教育的 历史传统与基础

新中国扫盲教育的
历史传统与基础

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我国逐渐从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阴影下走了出来。1999 年 10 月 18 日,教育部长陈至立在“第三届亚洲扫盲论坛”开幕式上郑重宣布,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中国已从文盲人口占 80% 的文盲大国变为非文盲人口占 80% 以上的教育大国。到 2000 年末,基本实现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我国扫盲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扫盲运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也可以说,上述扫盲教育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新中国的扫盲教育是从旧中国扫盲教育发展而来的。我国扫盲教育从清末开始,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扫盲教育为新中国的扫盲教育提供了可资继承的历史传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708 页。

一、清末、民国时期扫盲教育概况

(一) 清末时期扫盲教育概况

我国的扫盲教育开始于清末,其思想发端是维新派“开民智”的“新民”主张。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端棻奏陈广设学堂外,另设藏书楼及报馆,“以开通民智”。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又颁布了举办简易识字学塾的计划,提出十年后人民识字者达到5%。该计划具体实施是在1909年(宣统元年),学部制订《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要求由京师起逐渐推行,并责令各省督抚饬学司按年确查识字者人数。识字学塾招收年长失学和贫家子弟无力就学者,后专招收年长失学者。学习年限初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后改为一到两年,每日授课2~3小时。课程有国文、国民道德、算术、习字、体操五门,主要教材是简易识字课本。教师主要由小学堂教员兼任。经费包括官费和富绅捐助。免收学费,书籍用具由学校提供。

清末开展扫盲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列强入侵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看到了坚船利炮背后国富兵强与教育普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鉴于国内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借教人民识字明理,而骨子里却为了传达统治者之意旨,以笼络人心,防止革命。

清末扫盲教育注重识字,每日授课2~3小时,小学教师兼任、免收学费、分年筹设等,为后来扫盲教育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之后的民众学校,正是由简易识字学塾脱胎而来,民众学校的课程和学塾的也差不多,仅仅换了一部分教材

而已。清末的种种措施,就意义与价值看,虽称不起成就,而其后几十年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历次所规定的扫盲举措皆以此为蓝本,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二)民国时期扫盲教育概况

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注重社会教育,对扫盲教育有一定影响。我国第二次有政府规定的扫盲教育内容与做法,是在北伐成功之后的1929年。法令的名称是《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其科目是识字、三民主义、常识、珠算或笔算、乐歌。1932年曾一度修正,但对于课程方面无大变更。1934年6月又加以修正,改名《民众学校规程》,科目改为国语(包括公民及常识)、算术、乐歌、体育;高级班并加授职业教育的科目。到1935年又颁布《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对于各科课程标准均有详细规定。例如国语科之目标定为:能由注音符号读出汉字;学习浅近的语体文,以培养阅读普通书报及文字的能力和兴趣;运用日常应用的语体文,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使人理解;练习书写,以达到正确清楚的程度。其最低限度则定为“初级结束”后:能拼写注音符号;能阅读浅易文字及简单文件,明了其意义;能阅读注音民众读物;能正确无误地写常见汉字;能写简短的文章,文法上无重大错误,使人理解。国语一向被看做民众学校的主要科目,以这一门主要科目的标准为例,可以窥见扫盲的主要要求为识字,而这些年的内容与做法也就以识字为中心了。

抗战期间,又有《修正民众学校规程》公布,时间是

1939年5月。科目和从前一样,只是说“施行自卫训练者得不设体育”。课本要采用部编或审定者。为适应环境需要,得另编补充课本。单独设立的民校,得斟酌地方需要,开展下列各种简单社会教育事业:举办通俗讲演;置办通俗图书,公开阅览;编写壁报,传播时事消息;办理民众体育及卫生事宜;办理礼俗改良,提倡正当娱乐;接受民教馆之指导,办理生计教育;协助民教馆之巡回施教工作;办理其他有关社教事项。这一套是为抗战而增加的新做法,也就是赋予民众学校的新使命。

为配合抗战建国,国民政府颁布了新县制,紧跟着为配合新县制而制订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在具有时代意义的国民教育的内容与做法上,提出应以一切事物现象为教材,注重训练国民如何做人、如何办事,并且把中山先生所昭示的革命建国之要义以及地方自治、粮食土地管理等事务,与中央所颁布之七项运动办法,都包括在教育范围之内。还认为,学校之目的在于读书识字之外,当注意双手万能,力求实用。这些话,都是为了在内容上使教育与生活能切实连成一片,在做法上矫正过去“学校之教师,仅为课堂内之讲课,而出校后之学生及校外之社会环境如何,均不注意”的错误。但是尽管要求如此,尽管把扫盲工作交给了国民学校,然而在一大套关于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做法完全承袭了旧传统,“成人班”的课程仍照《修正民众学校规程》办理。修正规程是1939年5月公布的,国民教育是1940年3月才创生的,后者却以前者所定的课程为内容,而前者是从清末一脉

相传下来的,后来只好再加上一个《国民学校和中心学校办理社会教育要点》。国民教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已过去,而谈到扫盲的成绩,除掉若干靠不住的数目字外,看不见什么,由此可以体会到内容与做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从清末开端,官方的扫盲教育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也就看不到有多大的成就。虽然清末并非全套抄袭外国,而一则在观念上继承了中国的受教育就是识字读书的传统思想;二则扫盲是全部教育的一个环节,全部教育既然在做法上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的班级制,则扫盲也不能独辟蹊径;三则虽然到抗战时期产生了以配合抗战为幌子的新县制,事实上依旧谈不到建设,扫盲教育自然也就变不出新花样来。以班级制为躯壳,识字读书为内容的扫盲,何以无所成就?道理很简单,客观事实表明:成年文盲是穷苦落伍的生产劳动者,是被禁闭、做牛马的妇女,穷苦到不能入班级,被禁闭而不能入班级,落伍到不需要识字,当奴隶则更不配读书,所以上述的内容与做法恰好全盘地为所要扫除的男女文盲所否定。

民间扫盲教育活动是在旧路走不通之后,不得不摆脱法令拘束,根据客观环境的需要而自由创造出来的,时间久了,便发展成另一套。可作为代表的有定县的平民教育、无锡的民众教育、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邹平的乡村建设和陶行知的乡村工学团等。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扫盲教育

对广大群众实施文化教育特别是扫盲教育是革命根据

地教育的重要任务,各根据地的扫盲教育都得到蓬勃开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都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地区,文盲占90%以上,所以苏区将群众教育的重点放在扫盲上,大力开展识字运动。首先是在红军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进行识字教育,然后推广到广大群众。1933年10月,苏区文化教育建设大会作出“消灭文盲”的决议,并建立起乡、村两级消灭文盲协会。乡设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短训班等,以集中识字,培养识字骨干。村设若干识字组,作为扫盲的基本组织。在城镇中则既有集中扫盲的组织,也有各单位设立的夜校和识字组。红军中由连队组织识字班组,依文化程度分成甲、乙、丙三组,由文化程度较高的首长任总教员,连队的文书任甲组教员,采取连环式教学,使识字活动高度机动灵活,工作学习两不误,收效很大。

识字班在当时的扫盲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根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根据地共有32388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群众有155371人。其中以兴国县最多,全县有3337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群众有22529人,夜校学生有15740人,其中女子占60%。为配合识字运动,各地编写了大量的识字课本和辅助教材,当时流行较广的有《工农兵三字经》和《初级课本》。

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继承苏区的群众教育特别是扫盲教育的传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教育机构。按照1939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